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

香港的命运从来同祖国紧密相连。近代以后，由于封建统治腐败、国力衰弱，中华民族陷入深重苦难。19世纪40年代初，区区一万多英国远征军的入侵，竟然迫使有80万军队的清朝政府割地赔款、割让香港岛。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更是一次次被领土幅员和人口规模都远远不如自己的国家打败，九龙、“新界”也在那个时候被迫离开了祖国怀抱。那时的中国历史，写满了民族的屈辱和人民的悲痛。只有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赢得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新中国之后，中国人民才真正站立起来，并探索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光明道路。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经过近40年努力，开创了中华民族发展崭新局面。

——摘自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
（2017年7月1日）

背景资料

香港割让：1841年至1898年期间，清朝政府在英国的武力威逼下，先后三次与英国签定不平等条约，分别割让香港岛、九龙半岛及租借新界（包括新九龙）给予英国，成为英国殖民地。

香港割让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1年）被英国打败，被逼于1841年签订《穿鼻草约》，将香港岛割让予英国。1842年，清朝与英国再签订《南京条约》，香港岛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这次战争，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清朝再于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被英国与法国的联军打败，被逼签订《北京条约》，将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部分纳入香港殖民地，交由英国管治。

1898年，英国再逼使清朝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方及附近二百多个离岛，成为香港殖民地的一部分，为期99年。在清朝政府力争之下，九龙寨城的管治权并没有交给英国。

直到198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英国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确定1997年7月1日起，香港主权将移交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此举标志着香港的殖民地时期正式结束。

聚焦讲故事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一个郊区农民打造的抗战纪念馆

本报记者 杨俊峰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
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千年前，民族英雄岳飞写下这首墨意淋漓的《满江红》，放眼山河，满腔热血。这首词也道出了古往今来流淌在国人血脉里的民族精神。林则徐有一句诗说得更贴切“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就是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任时光飞逝，斗转星移，沧海桑田有变，唯有爱国之心永恒。就像80年前那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全面战争一样，4万万同胞同仇敌忾，上千万军队团结一心。从北京到云南，中国军队在华夏大地上前后与日军展开了22场参战人数上百万人的大型会战。从敌前到敌后，杀声震天，血流成河。如今，荒草埋没了战场，老兵也所剩无多，历史似乎已离我们远去。

但是时间总会留下蛛丝马迹，在北京市昌平区一家熟肉铺的地下室里，有一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馆里架子上带着弹孔的残破钢盔、2000多发被打出的锈蚀子弹以及仍然残留着斑斑血迹的军刀还在讲述着当年的故事。

这是一个北京郊区农民用12年时间打造出的历史相册。直到现在，这位农民还在路上奔波，努力告诉世人：历史，依然在我们身边。

图为南口战役纪念馆馆长杨国庆。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图为杨国庆在北京市郊区的南口山区挖掘抗战遗物。 本报记者 杨俊峰摄

长达12年的战场寻迹

昌平农民杨国庆今年54岁了。

54岁，对于一个人是什么概念？孔子曾说：“五十而知天命。”对有些人而言，54岁，已到了对自己人生下定义做总结的时候了。可是杨国庆不这么认为，因为他还有事情没做完。这件事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甚至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事情”。

杨国庆想在家里开一个抗战历史纪念馆。

“为什么我的博客叫‘南口战役纪念馆杨国庆’，是因为多年来我一直有这么个心愿，在我的家乡昌平建一个实实在在的南口战役纪念馆，把我多年来在南口战役战场上挖掘出来的历史遗物陈列出来，让后人不要忘记那一段光荣的历史。”

杨国庆并不是历史学专家，也不是军事迷。事实上，他只是一个熟肉铺的小老板。老杨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山里徒步，他在青藏高原登过山，也在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穿越过热带雨林。改变他人生的是2005年的那个夏天。那年夏天，他在家门口的南口山区野游时，在土里发现了一枚子弹壳。

“我家门口还打过仗呢？”老杨狐疑，“我以前怎么不知道？”

老杨有一个优点，就是一旦好奇心被激发，就喜欢刨根问底。这次也一样，他拿着子弹，找到昌平当地的文物专家鉴定，又找山下的村民打听。终于，他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自己家门口，还真打过仗。

这场名叫南口战役的仗，是“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在北京地区正面交锋的第一战。战事异常激烈，但在日军以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攻击下，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被迫撤退。日军最终得以越过长城，进逼山西。

1937年8月31日，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的《解放》周刊第1卷第15期，有一则短评对这场战役做出如下评价：“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

“它本该长久地活在咱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可是42岁的我在那之前却完全不知道自己家门口有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杨国庆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要让当年的战争遗迹重现世间，让更多的人知道南口战役，去铭记历史，去缅怀英烈。

于是，从2005年到2017年，杨国庆走遍了南口山区22个山头，走到已经被荒草掩埋的老长城脚下，踏进满是荆棘的荒草丛中，寻找战场的遗址，挖掘战争遗迹。在他家里的地下室中，有一幅他手绘的南口山区地图，几乎每一座山头上都画着一个小红旗——那是杨国庆去过的地方。

坐在村头的抗战老兵

“格格鸣～”

几声鸡鸣打破了村头的沉静。

这里是河南省洛阳市远郊的一处小山村。在村头一个老旧的竹椅上，坐着一位老人。

他的衣衫破旧，两鬓斑白。胸前佩戴着两个闪闪发光的奖章。

他就那么安静地坐着，一动不动地看着远处的大山，太阳正在那里慢慢西斜。

时间似乎已经把他遗忘在这大山里。

老人名叫刘宗玉，今年100岁。作为南口抗战仅存的几位老兵之一，刘宗玉的身体还算硬朗。在他97岁生日的时候，还可以吃一大碗白面条，高兴时可以喝一整瓶啤酒。

2008年，杨国庆第一次找到了老兵刘宗玉时，印象非常深刻。“他当时就是穿着个破棉袄坐在村头，看见我来了跟我打招呼。”杨国庆说，“老人家里不富裕，我去看他时他棉袄里的棉花都往外翻，每个月生活费不超过300块钱吧。”

“老人跟我说共产党好，今年过年还给我发了一壶油，党的关怀我感受得到。”杨国庆说到这里，眼泪止不住往外流，“然后他说，汶川地震了，我也没钱，我就捐10块钱吧！”

杨国庆的到来让刘宗玉感到欣慰。在老家的村子里生活了数十年，岁月久远，当年抗战轰轰烈烈的历史记忆对他而言如天上渐渐消散的白云。随着时光的流逝，已模糊在记忆深处了。家人有时候会问起自己的过去，可是刘宗玉已经不愿意说了，太久太久了，久到他以为所有人都忘了，他自己好像也忘了。

来看刘老的杨国庆，给老兵戴上了两枚纪念抗战胜利的勋章。刘宗玉如获至宝，在戴上的瞬间老泪纵横，“我以为大家都忘了，原来你们还记得……”

兴奋之余，老兵激动地唱起了当年在南口战场上杀敌时的军歌：

“咚咚嘞，战鼓声。潇潇嘞，战马鸣。杀，杀，杀，把敌人杀干净。杀，杀，杀到日本东京！”

杨国庆说：“你说历史是什么？抗日战争的历史又是什么？是写在史书里的文字？是埋没在荒草堆里的战场？还是这些经历了战争活到现在的人？如今，老兵在一个一个凋零。战场如果没人去寻找，就算有人到了打仗的地方，又有谁知道自己脚下就是当年中国士兵搏杀的阵地呢？而历史的文字，读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藏在地下室的国家记忆

在杨国庆的熟肉铺，有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小地下室。

打开灯看，里面的陈列让人震撼。

2000多枚生锈的子弹整齐地排放在展板上，带着弹孔的钢盔静静地躺在旁边。日军制式的防毒面具和军用水壶摆在架子的下手，旁边挂着1把已经锈蚀的日本军刀。

野战山炮的炮弹冷冷地矗立在门边，顺着它看去，在房屋的正中间，是一个简陋的作战台，杨国庆那幅绘着小红旗的南口山区地图就躺在上面。昏黄的灯光洒在台上，似乎在诉说着过往的峥嵘岁月。开灯的一瞬间，安静的地下室里仿佛有了千军万马，军号声、枪炮声、硝烟弥漫的战场如幽灵般在脑中浮现并回荡，挥之不去。

在展厅的正前方，有一个用废旧子弹壳摆出的大大的“魂”字。

“现在昌平的军队和学校也邀请我去讲课，我主要给他们讲中国人的魂。”杨国庆说，“所谓‘魂’，我的理解是对民族魂、军魂和灵魂的追思。12年的挖掘工作让我认识到，我们的军人在任何时期，都勇往直前，死国无憾。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死亡是我们无法回避的。重要的不是要哀悼死亡，而是要纪念、要铭记，要表达我们对烈士的敬重和追思。”

12年来，杨国庆走遍了南口山区几乎所有的山头，几乎寻访了山里每一个村落，不惜大量消耗家里微薄的财产以支撑自己的寻访和挖掘之路。最终从山里挖出3000多件遗迹，把历史本真的面貌呈现在世人眼前。

2016年5月，杨国庆在上山寻找遗迹的途中腿部受伤，手术之后，腿脚已经不再灵便了。12年的时间，把他从一个激情洋溢的壮汉变成两鬓发白的老者，他把自己人生最精华的时光献给了再现抗战历史的事业。

2015年9月3日，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在观看习主席讲话直播时，杨国庆哭了，哭得很开心。

“折戟沉沙铁未销”，长城砖下，山河依旧，而中国人民对于抗战英雄的追忆，也如那黛色青山，与天地相连，绵绵无尽。

图为杨国庆花12年时间在自家地下室打造的南口战役纪念馆。 杨国庆摄

图为徐宜发在驾驶动车组。

徐宜发：我驾驶过四种火车机车

陆怡彤

中国铁路机车发展历经蒸汽时代（烧煤）、内燃时代（烧柴油）、电力时代和动车组时代，如今，“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已奔驰在中国大地上。原郑州铁路局局长徐宜发，不仅作为管理者，更作为亲历者，驾驶过四种火车机车，见证了铁路的变迁。“我从小就喜欢火车头，整天围着它转。”说起自己的故事，徐宜发一脸幸福。

1968年，19岁的徐宜发从郑州铁路司机学校毕业，在江岸机务段出乘蒸汽机车。当时，蒸汽机车是中国铁路的主要牵引动力，它利用蒸汽机，把燃料里的热能最终转化为机械能，使机车运行。徐宜发先从司炉做起，负责给蒸汽机车添煤烧火。“蒸汽机车的驾驶室只有几平方米，又小又热，夏天时室内温度更高。”徐宜发说，每天不停挥舞手中铁锹，将十几吨煤抛入锅炉，整个人都被热浪与煤灰包裹着，“身上又是煤，又是汗，下了班倒在床上像散了架似的”。1973年，徐宜发被调入郑州机务段，提升为副司机。他一有练车的机会，便驾驶着蒸汽机车在郑州至三门峡间穿梭。

徐宜发还记得开内燃机车时，是1975年底。那时，他成为郑州机务段首批“代务司机”，登上了火车司机的宝座。从蒸汽机车转为内燃机车，机车司机的工作也发生革命性变化。由于内燃机车依靠柴油牵引动力，驾驶室里不需要司炉加煤加水。驾驶室内也明亮宽敞，司机操作时视野开阔，既方便又安全。新型号机车的运用，也给司机带来了新的技术挑战。为了尽快摸透机车性能，徐宜发每天下班后，都研究内燃机车教科书和电路图到深夜。他很快便掌握了机车的操作方法和原理，能得心应手地处理机车常见故障。

1990年，41岁的徐宜发再次转型成为电力机车司机。这一年，郑州机务段完成了电气化改造，京广线开始使用“韶山”型电力机车。电力机车通过电力驱动，列车行驶时产生的噪音减弱，轨道更新为无缝钢轨，旅客几乎感受不到颠簸。此时，徐宜发是郑州机务段段长，他常常跟车学习驾驶技术，在检查任务时，还会试开一段路。“以前，内燃机车有个柴油机‘轰隆隆’响个不停，车厢内总是油乎乎的。现在，电力机车的性能好、噪音小，车厢内干净整洁，令人眼前一亮。”徐宜发说。

2007年初，郑州铁路局盼来了第一列“和谐号”动车组。4月4日，58岁的徐宜发驾驶“和谐号”动车组在郑州至小商桥间，进行提速试验，动车时速为254千米。“和谐号”动车组在郑州正式运行，徐宜发比谁都高兴，“‘和谐号’动车组节能又环保，‘一溜烟’似的在绿色大地上划过，可比40年前的蒸汽机车跑得快多了”。

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从电力机车再到高速动车组，这些不同型号的机车，陪伴徐宜发走过漫漫人生路，同时，也见证了中国铁路由“追赶者”变为“领跑者”的艰辛历程。如今，“复兴号”中国标准动车组诞生，68岁的“老铁路”徐宜发提笔写下：“中国高铁传喜讯，复兴动车展翅飞。兴路强国攀高峰，人民铁路为人民。”

聚生相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